

《汤豪塞》：中央歌剧院事业的里程碑

景作人



歌剧《汤豪塞》剧照 本报记者 陈曦摄

日前,在国家大剧院2012歌剧院季闭幕演出中,中央歌剧院推出了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汤豪塞》取得了很大成功,并在首都音乐界掀起了不小的震动。

中央歌剧院演出《汤豪塞》始于去年,那是在2011年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当时该剧在北京天桥剧场连演两场,产生的反响相当强烈,接下来,该院又于2011年11月南下福州,在第一届中国歌剧节中再度演出该剧,并由此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演出奖、优秀表演奖、优秀指挥奖、优秀导演奖、优秀舞台美术奖等多种奖项。《汤豪塞》在当时掀起了一阵颇为轰动的效应。

中央歌剧院院长、艺术总监俞峰针对《汤豪塞》的上演曾经说过:“演出瓦格纳的歌剧是一项庞大的艺术工程,它需要各方面过硬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些先决条件,这项艺术工程是绝不可能完成和实现的。”

强大的艺术实力是演出成功的“本钱”

中央歌剧院上演《汤豪塞》,从主要演员阵容、交响乐团阵容、合唱团阵容、舞台美术阵容(包括灯光、服装、化妆)等方面看,都体现出了以完美、完备、强大为特点的综合实力,至于指挥和导演,更是在艺术上充分展现了难得的才华,为歌剧的成功上演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此次《汤豪塞》的演出,除了饰演汤豪塞的美国男高音歌唱家迈克尔·普奇外,所有角色均为中央歌剧院演员担任。其中,女高音王威饰演伊丽莎白、女高音阮余群饰演维纳斯,男中音王海涛饰演沃尔夫拉姆、男低音关致京饰演赫尔曼、男高音李想饰演瓦

尔特、男高音刘怡然饰演海因希,男中音张鹏饰演比特罗尔夫、男中音於敬人饰演赖恩马尔、女高音冉婷饰演牧童。

人们都知道,瓦格纳的作品费工费力,演唱难度大,对演员的艺术功力要求较高。而中央歌剧院的年轻歌唱家们不惧艰难,他们刻苦钻研,以辛勤的血汗换来了成功的硕果。演出中,这些角色演员不仅用德语出色地完成了音乐唱段,还以入情的表演征服了观众。

中央歌剧院合唱团的表现同样出众,第二幕中庞大的混声合唱完成的质量颇高。他们唱出了

水平、气势,声音上显得相当纯正,表演上亦丝丝入扣,毫不懈怠。听着他们高亢雄浑的声音,观众的心中油然而生了一种震撼的感觉。

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在演出中给人们带来了技术精湛、声音纯正的印象,在俞峰的指挥下,各个声部均达到了上佳的演奏效果。

《汤豪塞》的舞美效果(包括灯光、服装、化妆)令人赞叹,全剧在这方面给人们带来了“醒目”的感觉,其中立体化、真实化、虚拟化的效果十分鲜明。

《汤豪塞》演出的成功,俞峰功不可没。他以极大的气魄和胆量选中了瓦格纳的巨著作为艺术突破口,率领中央歌剧院完成了首开先河的巨大跨越,继而,他又以优秀指挥家的功力及技巧,带给了观众回味无穷的艺术思考和艺术享受。从两场演出的总体效果看,俞峰称得上是一位精通瓦格纳的专家,他对于作曲家的音乐思维、戏剧思维乃至哲学

思维,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演出中,他以非凡的驾驭力指挥着百人交响乐团和百人合唱团,将台上的演员与乐池中的乐团融为一体,共同创造出了一种强大的氛围,使观众在瞬间便被瓦格纳庞大而又深刻的艺术构思牢牢吸引。

艺术实力是完成一项艺术工作的本钱,《汤豪塞》的成功上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央歌剧院的艺术家们都具有过硬本领,其经验和技巧堪称一流。以这样的阵容“出战”,可以想见“战而胜之”是必然的。

强大的剧院规模是演出成功的基础

近年来,以俞峰院长为首的院领导班子,励精图治,大胆改革,以强化管理意识、激活业务建设的积极态度,倾力打造中国歌剧艺术的巨型“航母”。

自2009年开始,剧院开始了对歌剧团(独唱演员)及合唱团的改革与扩编,两年间,一大批毕业于全国各个艺术院校的优秀青年歌手被招聘进入剧院,尤其是合唱团,通过多次严格的考核招聘,目前已经达到了百人以上的编制。就是这个改革后的百人合唱团,为此次演出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烘托作用。人们看到,舞台上的合唱团声音整齐,站位充实。他们的演唱无论抒情委婉还是雄壮高亢,都有着深层次的厚度和清晰的穿透力。

2010年,剧院又着手对交响乐团及舞美工作队进行了同样的改革扩编。以交响乐团为例,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各类招聘手段,乐团由原来的七八十人增加到100余人,还特招了一些实力不凡的“外籍”演奏家。在俞峰“建设一支国际化水准的乐团”的设想和规划下,乐团通过严格的考核招聘上岗,使乐团在年龄结构上达到了精良化,技术结构上达到了精良化,这一切都显著地提高了乐团的演奏质量。

与此同时,剧院舞美工作队亦采用同样的办法广纳人才,在较短的时间内,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等一系列专业都招聘

了新人,还正在建立剧院专属的舞美工厂。这一切都为舞美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中央歌剧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这个有着60年建院历史的老剧院焕发了青春。发展和扩大后的新剧院,拥有更多的优秀艺术家,更丰富的多方面人才,更强大的剧团规模。而正是有了如此强大的院团规模,才使得《汤豪塞》的上演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强大的经济后盾是演出成功的保障

此次成功上演《汤豪塞》,中央歌剧院经济方面并未捉襟见肘。原因是,近年来,剧院坚持改革理念,加大市场运作,合理安排各类商演,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而演职人员则不辞辛苦,除歌剧演出外,每年还要演出大量各种形式的综合音乐会。就这样,依靠自身的积极运作和积极行动,剧院仅2011年就获取了3300万元的演出收入(2012年将更多)。这些收入的一部分,最终成为了歌剧《汤豪塞》上演的基本资金。由此看来,中央歌剧院在歌剧事业的发展运作上是有准备的、有措施、有远见的。俞峰依靠鲜明的改革意识和灵活的思想方法,使以往耗资巨资的歌剧演出得到了轻松的经济保障,顺利地将其纳入到良性循环的轨道中,达到了“高低搭配”、以商演养歌和双赢的目的。

2011年,中央歌剧院不到一个月就拿下了《汤豪塞》,今年的复排时间更短,前后仅半月有余。尽管如此,人们在演出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却是精致而细腻的效果。这一切都证明,中央歌剧院是一个实力与经验并存的过硬团体,作为国家歌剧院,它有能力担负各种高规格、高质量、高水平的歌剧演出。

《汤豪塞》是中央歌剧院近年来歌剧演出的一个亮点,也是剧院歌剧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象征着中央歌剧院在专业能力和综合实力上已经登上了新的台阶。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启迪。

启蒙与被启蒙

周玉宁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启蒙与被启蒙者地位的互换与轮转,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启蒙这个词,自“五四”以来就被频繁使用,通常是指上对下、知识阶层对大众的思想与知识的启蒙,这样,所谓的“上”或者知识阶层就成了启蒙者,而普罗大众则成了被启蒙的对象。这个观念,一直延续下来。在“五四”时期,知识阶层意气风发,掀起了一场面对全民的启蒙运动,最著名的废文言、兴白话,为的无非是新知识更加便捷地向大众普及,其间所产生的新文学作品很多已成为现代经典,而为人们所推重。启蒙总是知识阶层占有优越地位、大众处于蒙昧状态。那么,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是否就这样一直处于自发者与被自发者的地位呢?其实,知识阶层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感觉到大众的力量,鲁迅的《一件小事》写人力车夫的高大和作为知识者的“我”的卑小,其实就已经讲出了后来文艺界所常说的“劳动者最光荣、最伟大”的意思。

中国的知识阶层无论处于何种状态,总是爱着国家与民族,处于上位时总是要启蒙大众、将自己的思想意识传播出去;处于低位时,总是要“位卑未敢忘忧国”,实则总是处于一种自我拷问与言说的状态。只是,所谓“被启蒙”的大众是否认可并赞同,是否将这些“启蒙者”奉为上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谓“启蒙与被启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的期许,一种自身价值的投射。当民众认可并愿

意奉养时,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才能实现,个性可以张扬,思想可以传播;当民众将知识分子视为粪土时,知识分子的理想只能搁置,并且只能处于自抑状态、自我折磨,因为谋生能力的欠缺甚至生存境况比一般人都要悲惨。但是,当知识分子处于低位时,仍然可以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比如,中国封建统治最黑暗的元代,优秀知识分子关汉卿等人便在勾栏瓦舍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空间,写出了《窦娥冤》、《救风尘》等流传千古的杂剧。其实,传统的说法:“上善立德,中善立行,下善立言”正是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各种选择,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下,知识分子是可以选择的,但如果处于元代那种社会,知识分子就只能沉抑下僚了。

上面说的情况,其实还是知识分子与民众传统的、经典的关系。社会发展当下,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已经有了新的质素。当民众的知识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创新能力有了不可低估的跃升,社会从知识到信息的传播有了全新的形态之后,启蒙也就有了新的含义,知识分子只有具有超越一般知识的更高创新能力,才能成为新的时代潮流的引领者,启蒙也就有了难度,而信息的最新掌握者也就有了相对的优先权。在当下,互联网盛行,网民人数已经占到全国人口的1/4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地上升,信息爆炸已成为现实。如何得到信息已经不成问题,问题在

于如何利用信息,为个人还是社会服务?传统的知识已经在泛化并贬值,实用知识盛行,社会流行技术知识分子,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被边缘化,传统意义上的启蒙已经难以以为继。

在纷繁的现代社会生存困境下,传统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全新的社会形态时,往往自己既是启蒙者也是被启蒙的对象。这是一个全民共语的时代,民众对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正在发表自己的看法,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硕士生、博士生的数量正在急剧地增加,各种新型职业业兴,技术的进步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样态。在新的生活样态下,因为各种各样的复制与盗版,造成知识和创意的贬值;面对新的社会形态,技术或人文知识分子很多已经向文化商人转型,传统意义上的启蒙与被启蒙者已经向文化商品交易的卖主与买主转化,文化买卖与交易正在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与写作挤向了边缘,金钱的力量正在朽化着我们的人文传统。

对于那些在启蒙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年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不完成新的角色的转化,失落是难免的。只是,面对社会巨变的洪流,主动适应也罢、被动改变也罢,新的角色的转化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种变化,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应该要有勇气坚持下去并且承担起自己对于社会、对于民众的责任与义务。

执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

本报记者 刘茜

“译经论典最倾情,弘扬马列最忠贞。勇于开拓迎挑战,坚守阵地献一生。”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陆梅林,因病于今年3月13日逝世,享年89岁。7月19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承办的“陆梅林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宣部原副部长、文化部原代部长贺敬之出席会议。郑伯农、周忠厚、赵铁信、刘润为、徐武生、李正忠、高叔眉、陈飞龙、祝东力等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和高校的4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陆梅林的家人、学生一同深情缅怀陆梅林生平业绩,追念他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回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三种疑问

陆梅林生于山东济南,1951年调入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任翻译,1953年调入中央编译局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介绍说:“陆梅林1979年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先后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任职期间创办并主编了《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学术刊物。陆梅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工作做了重要贡献。”

陆梅林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美学、文艺学翻译,研究40多年,共编、译、著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唯物史观与美学》等30余种。与会者认为,陆梅林是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和精神的,所以他的理论研究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体系、性质、构成和方法,其突出贡献是明确解答了三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有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二是他们的文艺思想的性质是什么,是人道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的具有高度党性的文艺科学;三是要不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美学和文艺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第一个问题的产生背景是: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苏联一些学者就曾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无系统、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卢那察尔斯基曾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零散见解……”我国上世纪80年代也有人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论著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些“断简残篇”的观点。对此,陆梅林提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些卷帙浩繁的著作、书信、手稿和札记之中蕴含着这一体系的一切基本原则、观点和原理,并且用他们的科学方法论和原则将其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个迄今还是不可逾越的有机整体,分散是现象,整体是本质。”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刘文斌赞叹说:“陆梅林运用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使其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一个完整理论体系的观点得以确证。陆梅林从纵横两个方面入手,在纵的方面,他对马恩文艺思想的发展做了历史分期;在横的方面,他从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艺术社会本质论、艺术起源论、艺术发展论、文学艺术和无产阶级等8个方面,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艺思想的轮廓。这样就有力地澄清了种种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科学体系的错误说法。”

陆梅林学生、文艺报社理论部主任熊元义在怀念教师的发言中说,陆梅林老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的精神实质不是人道主义,而是无产阶级的具有高度党性的文艺科学。”陆梅林曾说,“多元论”的理论从政治上来说是反对、否定和排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从思维方式上来说是搞折衷主义,是形而上学……所以,鼓吹“多元并存”,实际上是一种折衷主义,它无原则地把内部互不联系而且根本上互相冲突的观点或学说结合起来。这种“亦此亦彼”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只看到了事物相互间的联系,忘了事物之间的质的差别,因而不可避免地搞中庸调和。这样,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三种质疑,陆梅林都进行了及时而必要的释疑解惑。

熊元义说:“陆梅林老师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他的文艺理论成就,而是在理论上坚定和一贯的高贵品质,即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在大风大浪面前不摇摆、在各种诱惑面前不苟且这种真正文艺理论家不可或缺的品质。”

陆梅林女儿陆华回忆父亲在工作上始终有饱满的工作热情,非常刻苦,非常勤奋,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睡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刚刚成立时,父亲礼拜天都不回家,“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者,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从年轻时代参加革命,一生信仰不变,非常坚定。”

“我们要学习、研究他的学术理论,继承他的思想遗产。”王能宪说。与会者称陆梅林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要继承他的思想遗产,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陆梅林的学生、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虞祖海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回忆了老师对他的辛勤培养。他1985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陆梅林和程代熙两位导师共同带领下进行了三年的学习。当时两位导师为他们安排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活动,在学业上严格要求让他受益终身。“一是要求我们读原著。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习和研究,要把握好它的精神实质,必须要认真真读原著,这是两位先生对我们始终一贯的要求。”二是特别强调学好外语。导师本人精通数门外语,从事了大量的国外经典作家和其他一些论者的翻译工作。两位导师往往会布置外语翻译的任务。我们学生翻译出来以后两位导师会认真地校改,这种非常细致的指导,在今天来看是非常难得的。”

陆梅林的老舍文学研究会,在学会上严格要求让他受益终身。“一是要求我们读原著。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习和研究,要把握好它的精神实质,必须要认真真读原著,这是两位先生对我们始终一贯的要求。”二是特别强调学好外语。导师本人精通数门外语,从事了大量的国外经典作家和其他一些论者的翻译工作。两位导师往往会布置外语翻译的任务。我们学生翻译出来以后两位导师会认真地校改,这种非常细致的指导,在今天来看是非常难得的。”

陆梅林的老舍文学研究会,在学会上严格要求让他受益终身。“一是要求我们读原著。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习和研究,要把握好它的精神实质,必须要认真真读原著,这是两位先生对我们始终一贯的要求。”二是特别强调学好外语。导师本人精通数门外语,从事了大量的国外经典作家和其他一些论者的翻译工作。两位导师往往会布置外语翻译的任务。我们学生翻译出来以后两位导师会认真地校改,这种非常细致的指导,在今天来看是非常难得的。”

陆梅林的老舍文学研究会,在学会上严格要求让他受益终身。“一是要求我们读原著。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习和研究,要把握好它的精神实质,必须要认真真读原著,这是两位先生对我们始终一贯的要求。”二是特别强调学好外语。导师本人精通数门外语,从事了大量的国外经典作家和其他一些论者的翻译工作。两位导师往往会布置外语翻译的任务。我们学生翻译出来以后两位导师会认真地校改,这种非常细致的指导,在今天来看是非常难得的。”

陆梅林的老舍文学研究会,在学会上严格要求让他受益终身。“一是要求我们读原著。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习和研究,要把握好它的精神实质,必须要认真真读原著,这是两位先生对我们始终一贯的要求。”二是特别强调学好外语。导师本人精通数门外语,从事了大量的国外经典作家和其他一些论者的翻译工作。两位导师往往会布置外语翻译的任务。我们学生翻译出来以后两位导师会认真地校改,这种非常细致的指导,在今天来看是非常难得的。”

陆梅林的老舍文学研究会,在学会上严格要求让他受益终身。“一是要求我们读原著。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习和研究,要把握好它的精神实质,必须要认真真读原著,这是两位先生对我们始终一贯的要求。”二是特别强调学好外语。导师本人精通数门外语,从事了大量的国外经典作家和其他一些论者的翻译工作。两位导师往往会布置外语翻译的任务。我们学生翻译出来以后两位导师会认真地校改,这种非常细致的指导,在今天来看是非常难得的。”

陆梅林的老舍文学研究会,在学会上严格要求让他受益终身。“一是要求我们读原著。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习和研究,要把握好它的精神实质,必须要认真真读原著,这是两位先生对我们始终一贯的要求。”二是特别强调学好外语。导师本人精通数门外语,从事了大量的国外经典作家和其他一些论者的翻译工作。两位导师往往会布置外语翻译的任务。我们学生翻译出来以后两位导师会认真地校改,这种非常细致的指导,在今天来看是非常难得的。”

动态

《理论热点面对面》紧扣时代脉搏

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辩证看 务实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2》发行半个月以来,该书销量已经突破100万册。该书关注了:收入差距如何缩小、房地产调控如何坚持、看病费用如何降低、素质教育如何推进、道德风气如何提升、食品安全如何保障、环境污染如何遏制、反腐倡廉如何深化。这本书回答了的8个问题无不紧扣时代的脉搏,广受人民的关切,既贴近了群众需求,又展现了理论的自觉与自信。

在这本书中,我们看不见板起面孔的说教,也看不到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这样亲切平易的语言

在书中随处可见。“讲道理用的是‘百姓语言’,举例用的是‘百姓故事’,让人看到了理论的活力。”网络上的许多留言也证明着这本理论读物的魅力。撰事实与讲道理内在统一,逻辑的力量与情感的力量相互交融,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了理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翻阅这本书,感觉理论就在自己的身边。”专家学者指出,这本书深入时代发展前沿,关注人们所思所感,用通俗的语言、清新的文风,全面辩证地分析怎么看,科学务实地阐明怎么办,深入浅出地解答了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架起了理论与群众、政策与百姓之间的桥梁。(边言)

纪录片《春晚》重温春晚三十年

7月16日,5集纪录片《春晚》登陆央视综合频道每晚22:30的《魅力纪录》栏目。《春晚》首次全面采访历届春晚的主创人员和春晚标志性人物,梳理从1983年到2011年春晚的珍贵影像,表达30年来春晚积淀的文化力量和引领风尚的社会价值。

30年间,春晚还逐步从一台电视晚会,演变成凝聚海内外华人家国情怀的情感纽带。例如从

费翔《故乡的云》、陈红《常回家看看》,到陈坤《好久没回家》,30年来以《回家》为主题的春晚歌曲数不胜数,拨动全球亿万华人的心弦。纪录片《春晚》总制片人、总导演刘元说:“从‘回家过春节’到‘回家看春晚’,春晚如何从普通的电视文艺晚会变成与国人春节相伴共生的文化现象?这是我们在纪录片《春晚》里努力探寻的,相信每一位观众会在片中找到答案。”(晗宁)

儒家伦理的“宗教功能”

长江学者高旭东近日撰文《论儒家伦理的宗教功能及其文化作用》,文中指出了儒家伦理,文中指出了儒家伦理,中国人就不再需要宗教了。

该文说中西文化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伦理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差异。儒家的伦理是从现实的血缘关系出发的一种准宗教文化建构。因而,儒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伦理教化,这种伦理教化是具有“宗教功能”的表现。在儒家这种现世的教化,能够超越死亡。对中国人来说,敬奉祖宗、孝敬父母固然重要,但是生育子女更加重要。儒家并不把个体看做是孤零零的个体,而是看做生命长

河里的一滴水。当然这里说的仅仅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就是要:上孝敬父母,崇拜祖宗;下生育子女,传宗接代。但是,作为士大夫,也就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还有更高的使命——跳出小家而利大家。为家国社稷、为华夏文化血脉的传承作出你的贡献。如果我们的文化传统在你这一代中断了,这跟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子女不能传代是一样的。就此而言,儒家文明的传承性与连续性很强。对于死亡的超越,儒家在现实的伦理中给予了圆满解决。

——摘自《理论学刊》2012年第3期